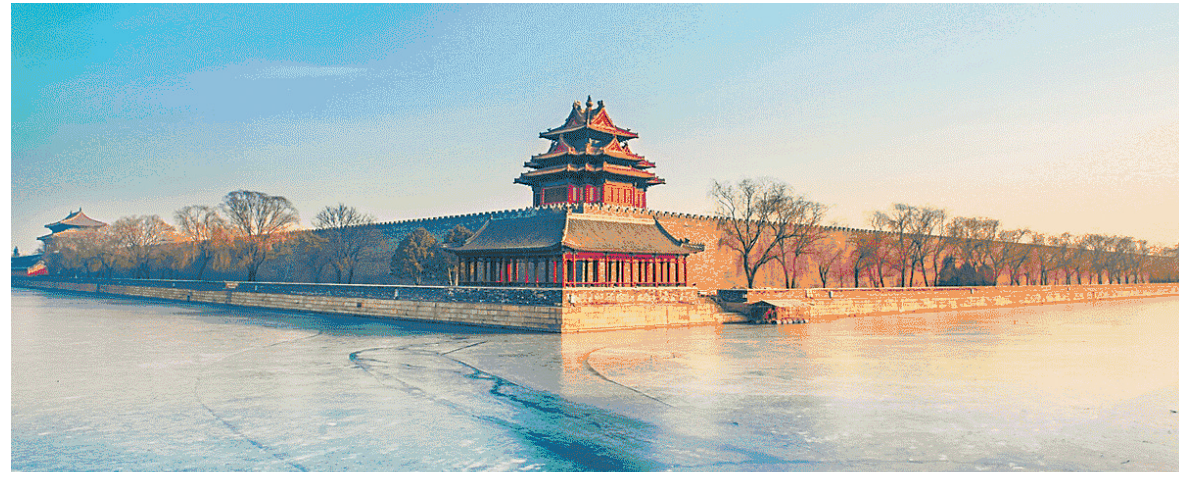


故宫600年：巍巍紫禁谁人修？

■ 吴辰



雪中故宫

今年故宫诞生600周年。一座城，沉淀了600年的记忆，存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气神。站在紫禁城中凝望，新老照片仿佛将时间之河折叠，历史与当下重合，经历600个春夏秋冬巍然屹立的故宫，充分表现出了中式建筑结构的优越性，特别是作为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式建筑，能数百年风采依旧，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博大精深。只是，给世人呈供了这样艺术珍宝的建造者是谁呢？

修建者没在正史上留痕

鲁迅曾经说过，所谓“正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所作的“家谱”，这话一点也没错。故宫虽大，所收集的旧物与文献虽多，却单单没有记下故宫设计者和修建者的名字。

故宫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此前大明国都一直在今天的南京。虽然明成祖永乐大帝足可称得上是一代明君，但他的帝位来得颇费周折，在他打着“靖难”的旗号从燕赵之地一路杀入金陵古城之后，一把诡异的大火就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痕迹完全抹掉了。在南京，永乐帝过得并不舒心，先是有御史大夫黄淮在朝堂之上刺朱杀驾；再是“叔夺侄位”的风言风语传到自己耳朵里毕竟不好听；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北地而来，面对着南京朝中旧臣，还真有点无力招架的感觉。于是，永乐帝开始思索着迁都的事情，并将新的首都定在曾经自己的封地——燕京北平。

有一种传说是当时的运输工人们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地就凿一口井，他们用春、夏、秋三季准备物资，在严寒时节开始运输，他们等到气温低到足以滴水成冰的时节，从井里取水铺成一条冰道，顺着冰道将物资运到施工现场。但是，这毕竟只是传说，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就故宫修建时运送物资这方面来说，永乐皇帝还真值得感谢元朝。

故宫主要设计者蒯祥

俗话说“先有大运河，再有北京城”，在古代，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可算是交通命脉，这条大运河修建于隋朝，到了元朝定都大都，为了南北交通方便，又将这条运河曲折处修直，并疏浚水利，全线通航，使南方的粮食物资能够直达大都，甚至直接把运河的终点修到了大都城内，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积水潭。明朝修建故宫时，运送建筑材料走的就是这条水路。

顺着水路来到北平城的不只是建筑材料，还有全国各地最杰出的



故宫主要设计者蒯祥

建筑工人，虽然他们的名字几乎没有被资料所记载，但是，故宫600余年的风雨历程已经为他们立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古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只存其迹，不知其名，修建故宫时人力耗费何止千万计，最终留下姓名的也只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这些能够留下姓名的匠人，都是业内不世出的天才，他们当中，以蒯祥最为有名。

蒯祥身为一个木匠世家，他的父亲蒯富在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的木工，手艺传到蒯祥这里，则更可以说是神乎其技了。蒯祥十几岁时，就已经名满金陵，南京城内很多著名的建筑在修建过程中都

有他的参与。蒯祥天生在建筑方面就有天赋，同一项工程，别人忙好几天才能做出的设计图在他那里只需要随便写写画画就能做出来，甚至还能双手画龙，画成后将二龙合一，竟然一模一样；蒯祥还有领导天赋，在他的手下，有着

永来皇帝修建宫殿，年仅二十岁的蒯祥作为工匠中的一员也来到了北京，身怀绝技又年富力强，蒯祥很快就在这批匠人之间享有盛名。到北京后不久，蒯祥就被安排去主持承天门的修建。承天门就是现在的天安门，是皇宫的正门，皇帝能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足以见得蒯祥技术的高超。给皇帝干活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弄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蒯祥在前辈匠人杨青、蔡信的协助下，主持并修建了承天门，随后又因其建筑天赋承建了故宫的主要设计工作。由于蒯祥在设计与修建故宫的

过程中劳苦功高，永乐皇帝很器重他，多次命其主持宫殿与皇陵的修建与维护工作，并封其为“蒯鲁班”。蒯祥也因此步步高升，直至官居二品，任工部左侍郎，北京有一个老地名“蒯侍郎胡同”，相传蒯祥告老卸职之后就是寓居于此。木工行中久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的说法，蒯祥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其实，蒯祥不只是一个人名，他是千百年来中国匠人工匠精神的化身，在他巧夺天工的技术背后，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智慧。

屡历劫难而重生

宫殿修好之后，永乐皇帝将其命名为“紫禁城”，“紫”代表了天上的紫微星，“禁”一方面有禁止的意思，一方面则是象征着守卫的森严，从名字来看，就知道这座王城固若金汤。但是，历史上的故宫，却屡次遭天灾人祸，但一次次又从劫难中重生。

故宫博物院原馆长单霁翔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故宫最怕火”，的确，对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而言，火灾是最大的敌人。而故宫乃是皇帝的住宅，它的安全兹事体大，而火灾则是种种意外之中最危险的一种，故宫内部古建筑众多，可以说是勾心斗角，腰腿缠回，一旦失火，烧着的可不只是一间半间了，古代灭火条件有限，火势一起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烧到无可救药为止。故宫从建成以来，大大小小火灾100余起，重大火灾就有30余起，而除了人为造成的之外，更多的是来自天灾。故宫建成仅9个月，一场雷击引发的火灾就使其严重受损，永乐皇帝不得不二度请蒯祥出马，对其进行修复；而刚修好不久，三大殿附近的另一处建筑又遭雷劈，所幸恰逢暴雨倾盆，此处建筑没有被焚毁。故宫怕火，这从故宫里随处可见的大铜缸中就能看出，历劫轮回，故宫如浴火的凤凰，越发壮美，而让故宫永葆美丽的，则是顽强而智慧的中华民族。

文史胡传的海南旧事

海南文化重镇安徽绩溪，位于安徽黄山与浙江天目山接合部，属“宣歙之脊”。

深厚的人文滋养出一代代风流儒雅的文人士子。胡传、程秉钊与邵班即为其翘楚，被著名学者胡适称为“近代绩溪三奇士”。

此三奇士中，有两人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于同一年（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分别登上海南岛，并留下了那年初关于海南的珍贵史料，此亦难得之奇人奇事也。

同年渡海来琼的两位绩溪奇士为胡传和程秉钊。胡传为著名学者胡适之父，一生辗转驰骋，南北奔波，期间竟然与海南结缘，实是缘分。

据我国老一辈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的外叔祖王胜之记载：“（胡传）先生治朴学，工吟咏。性乐易，无城府，兴至陈说古今，议论蜂拥，一坐皆倾……文士脆弱，先生独否。自言少时负五斗米山行百十里，若无其事者”。可见，胡传先生是个豪迈任侠、意气风发之士。

胡传（1841—1895），字铁花，守三，号钝夫，安徽绩溪上庄人，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的弟子。受老师影响，胡传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光绪八年（1882年），只身前往东北考察，后入吴大澂幕，随行营中，驻防吉林。在东北四年多，胡传曾两度遇险，几乎丧命。

1884年，吴大澂（吴湖帆祖父）转任广东巡抚，派胡传为特使，巡视考察海南黎峒。

据《胡适文集》记载，胡传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离京，历时一个月。所写日记《游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约一万两千字。

在海南这一个月，胡传虽有随从侍护，但仍历尽艰辛，备尝困苦。其行程如下：从琼山府城出发，经澄迈、临高、西至儋州。路上，胡传一行，自备油盐、蔬菜大米、咸鱼和烟叶等，在儋州换下原来的五个

那场大疫，夺走了建安“五子”

■ 赵染斤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一场大疫，不仅夺走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也加速了邺下文人群体的解体，导致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建安文学”进入低谷。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五个年号，从196年到220年。建安文学独具特色，诗词成果斐然。其表率作家主要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该文人集团形成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初，随“委质于汉南”的王粲、“归命于河北”的陈琳、“从宦于青土”的徐干和“殉于海隅”的刘桢等相继来到邺城归附曹操，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最终聚集。建安十四年二月，曹操军至江陵，置酒汉滨，饯宴群僚，陈琳、王粲、应玚、阮瑀等，有感于宋玉《神女赋》而各有同题之作。这标志着邺下文人集团诗赋唱和、互相赠答风气的最初出现。

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八年，是建安文学最繁荣阶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总结道：“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辞；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意思说，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遨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情感，光明磊落地施展才华。他们在还叙述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辞明句为贵。这些都是建安文学家们所共有的特色。

建安“七子”中，以颜值最低的王粲文学成就最高，被誉为“七子之冠冕”，与历史上“仙才”之一（另两位是李白、苏轼）的曹植并称“曹王”。他以诗赋见长，其创作的诗赋数量几乎等于建安其他“六子”的总和。《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赋的代表作。王粲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英雄”传记史书《汉末英雄记》的作者。然而，才华横溢的王粲却死于瘟疫。《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曰：“（王粲）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缘何“道病卒”？原来，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整军备战，治兵而征孙权，十一月攻占濡县。第二年正月，曹军屯兵居巢……二月时，与孙权在濡须口（今安徽含山县一带）交战，逼孙权退走。三月，战事稳定后，曹操领军还邺……途中，王粲染病而死。《三国志·魏书·刘司马张温贾传》“司

马朗”（司马懿的哥哥）记载了此次军中疫症：“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曹霖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宋代著名类书《太平御览》引曹植《说疫气》描述了这场瘟疫的毁灭程度：“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殒，或覆族而丧。”

其实，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在208年被曹操所杀，阮瑀于212年寿终正寝外，王粲和其余“四子”均因这场瘟疫病逝。

曹丕篡汉登上“九五之尊”后，时常怀念昔日与建安“七子”诗赋唱和、互相赠答的情景，并评价了“七子”文学成就。《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谓：“文帝《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曹丕《典论·论文》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标。”刘桢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极负盛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

一场瘟疫，夺走建安“七子”中五位文学家年轻的生命，加上孔融、杨修、丁仪等被杀，曹丕代汉称帝忙于政务，曹植备受曹丕猜忌，已遭软禁等原因，红极一时的邺下文人集团随即解体，建安文学也进入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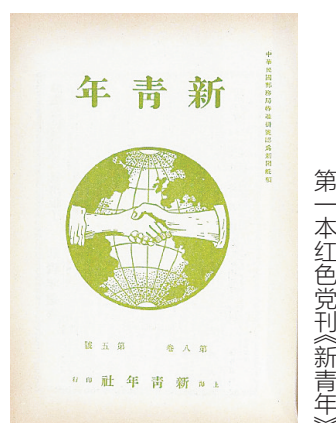


《建安七子图》（明 编本）王间作

同学校一叶

第一本红色党刊

■ 朱少伟



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是第一本中共党刊。其实，这并不准确，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前两个多月，《新青年》已改版为其机关刊物。

《新青年》（第一期刊名为《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店发行。陈独秀此时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问世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兴起。

1916年冬，陈独秀赴北京为杂志筹集资金。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求贤若渴，决定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却表示要返回中城，继续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希望其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并表示将给予支持。陈独秀接受受邀，《新青年》编辑部北迁。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堪称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登出孙中山“天下为公”和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刊载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10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和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照片；陈独秀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李大钊发表的《May Day 运动史》，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亟须一份机关刊物，据李达回忆：“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的改版筹备仅用一个月，它从1920年9月1日起呈现新貌，仍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这期杂志封面正中有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此时，《新青年》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陈望道晚年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同年12月，《新青年》为了抨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大讨论，发表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马克思主义》等。

在进行改版之际，《新青年》脱离上海群益书社，自建单独的新青年社。而且，设立总发行所于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福建南路处），由苏新甫主管。除了《新青年》，上海友社还发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应是“新青年社”初次见诸媒体。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又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译、蔡元培序的《社会主义史》，黄凌霜译、张伯伦校的《哲学问题》，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等。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

《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可以说，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进而又曾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绝非偶然。

（摘自《解放日报》之“100年前，共产党报刊在上海萌芽”）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